

ANHUI SHENG
ZHEXUE SHEHUI KEXUE
GUIHUA XIANGMU
CHENG GUO ZHAIBIAN

安徽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成果摘编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成果摘编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摘编 /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81110-945-0

I. ①安… II. ①安… III. ①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成果—汇编—安徽省—2001~2006
IV. ①C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5444 号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摘编

安徽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84mm×260mm
印 张: 31
字 数: 7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ISBN 978-7-81110-945-0

责任编辑: 马 乐 杜 娟 王云丽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鲁 榕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出版说明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自设立以来,着眼于推进理论创新,大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大力加强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安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安徽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集中介绍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安徽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从近年来已经结项的课题中,选择了部分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并汇集成册,以供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作决策和研究时参考。选编的研究成果忠实于原文,但受篇幅限制,对原文作了压缩和调整,如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安徽省社科规划办公室

2010年12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研究	罗本琦(7)
中国和平崛起论	杨守明(14)
安徽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对策	祝国华(22)
安徽“以工促农”新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路	吴 玲(31)
安徽新型工业化进程与资本市场关系研究	余华银(37)
安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科技支撑体系研究	蒋晓岚(44)
安徽与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整合与协调发展研究	苏 勤(51)
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与安徽经济发展研究	储节旺(58)
全民创业,优化安徽省投资环境研究	江三良(64)
安徽省地区经济差异及其协调发展研究	任志安(7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应研究 ——安徽个案分析	文忠桥(76)
安徽省就业弹性测算和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吴 骏(85)
安徽省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	蒋长流(93)
安徽“十一五”劳务经济研究	栾敬东(104)
安徽省建设节约型城市模式研究	赵良庆(112)
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对策研究	张立今(122)
新阶段安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洪功翔(128)
创新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研究	丁忠明(136)
加快安徽非公经济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周 焱(143)

安徽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文兵(150)
安徽省上市公司动态能力研究	胡旺盛(158)
基于信息经济学面向安徽的企业家选择及激励机制研究	刘银国(164)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问题研究	周亚娜(172)
安徽省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赵惠芳(179)
发展安徽高科技产业资本保障战略研究	盛明泉(188)
以城市化推动安徽省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周加来(194)
安徽省县域经济竞争力研究	朱道才(198)
安徽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	李姚矿(206)
安徽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监测分析与对策研究	马成文(213)
科学发展观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	汪时珍(223)
基于“三农”问题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研究	程久苗(227)
新农村建设中的资本市场支持问题研究	
——基于安徽省情的实证与规划	黄华继(237)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研究	贾敬全(245)
中国合作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王文举(250)
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其对策研究	李小群(253)
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欧阳仁根(260)
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与应对	魏玖长(264)
我国非公医疗机构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张亨明(272)
后税费改革时期的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李远行(279)
新时期乡村纠纷的特点、成因及其多元化解机制建构思路 ..	刘 鑫(286)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问题研究	胡功胜(293)
农民的文化消费与农村的消费文化	李稼蓬(301)
敬畏伦理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郭淑新(307)
安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与教育策略	叶松庆(313)
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研究	常 松(322)
大学生网络不文明行为的心理成因研究及对策探讨	胡志海(328)

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研究	王传旭(333)
教育公平与和谐安徽构建研究	王守恒(337)
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惠 圣(344)
安徽高校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发展研究	时 伟(351)
安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研究	陈 啸(355)
高等教育法律问题研究	石旭斋(364)
皖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汪谦干(369)
考古新发现与皖南早期社会专题研究	裘士京(378)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卞 利(381)
徽州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周晓光(391)
安徽传世农业文献整理与研究	刘亚中(396)
安徽省贵池县茅坦乡山湖村傩神会的田野调查报告	何根海(401)
“三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精神	李 健(408)
全唐五代安徽文人诗文用韵研究	储泰松(415)
共生与激变	
——论唐代诗歌在传奇生成中的作用	吴怀东(431)
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的联系与比较	胡传志(438)
桐城派与皖派	卢佑诚(443)
王茂荫生平和思想研究	曹天生(450)
赵朴初佛教思想研究	朱 洪(455)
20 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内涵研究	方维保(466)
中国现代讽刺诗研究	杨四平(473)
中国当代环境文学论稿	吴尚华(478)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取得了根本性的理论进展。首先,逐步摆脱和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而是当代哲学。众所周知,追求终极实在或终极本体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和根本内容,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从存在论的根基处揭露了西方形而上学对终极实在迷恋的无根性和虚无性,指证了整个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从而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因此,哲学的重心不再是虚假的天国,而是现实的人间;哲学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构造“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正是在此维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其次,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出现了“人学”、“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和“生活哲学”等不同的诠释和建构路向。这些不同的路向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都主张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着重研究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再次,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解读模式的“四大板块结构”的内容框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探讨了人道主义与异化、价值、现代性、发展观等时代和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强化了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解题意识,注重培育研究者的主体自我意识,主张在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传统解读模式的突破、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式的变化,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但是,与时代需要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探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获得巨

* 安徽师范大学张传开主持的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批准号为AHSK03-04D17)的成果摘要,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余在海、牛菲、方敏、干成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大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在酝酿和寻求着新的突破。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如何突破“主客体关系”模式却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新的形势需要哲学专业工作者不断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为此,本课题选择了“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价值”、“人道主义和异化”、“价值哲学”、“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发展观”等7个重大理论前沿问题,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高度,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的研究。

一、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著名论断,并认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待于“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对实践的理解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就会不同。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哲学界对实践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探讨了逻辑论证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并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目的”和“实践观念”范畴。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主要从历史观的高度探讨了交往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关系,凸现了实践范畴的交往维度。一方面,突破了仅把“交往”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过渡性概念的传统理解,从“交往的本质”、“交往的特性”、“交往的历史形态”和“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往范畴做了多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特别是历史观的高度对“交往实践”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质上就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这个阶段,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不仅从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内在关联,而且在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的当代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就不仅仅是认识论和历史观意义上的规定,而首要地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通过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马克思瓦解了以“内在性之主体性”为前提的主客二元对峙,终结了全部近代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才真正得以彰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研究

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已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研究中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迫切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的基本估价,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和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艰巨则在于哲学自身在当代中的处境。在当今时代,哲学由于对生命本身的背离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哲学仍在大学的体系和学院的建制中被广泛地谈论着;另一方面,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却似乎成了一种与生活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总是会遭遇到“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诘难。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因此,在这种境况中,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有所阐述。概要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而是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又引领着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在于它是实践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其主导语境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更不是生存伦理或价值哲学,而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生存论转向,以实践思维方式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实践生存论超越了实体本体论,从而在实践生存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但传统哲学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的前提都是主客二分的,即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处于抽象对立两极的前提下再试图去寻求二者的统一,因此,旧哲学都未能正确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了旧哲学的这一理论思维前提,确立了感性活动原则,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结。这种内在联结的始源不是别的,而在于“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①。人“通过自身的存在”,意味着人是在实践中自我筹划、自我生成的;自然界的“通过自身的存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自然界,既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言的在人之外的、纯粹的“外部自然界”,也不是黑格尔眼中“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感性自然。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活动即实践基础上的关系,亦即对象性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等都只能在实践关系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在环境危机、生态失衡、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等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理论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四、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当代解读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凸现相一致,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自1923年卢卡奇在柏林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和争执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曾展开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讨论中,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国哲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无论是人道主义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异化概念中所包含的历史性维度,都始终未被深思。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存在论差异。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人道主义始终是从Eidos这一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而得到规定的,是从“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而得到规定的。在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中,人的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人如何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生存,就被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而马克思思想活动的中心,恰恰就是要击穿理性形而上学的统治,揭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科学揭示,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应,“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就不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价值论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既不是意识的错觉和迷误,也不是人对自己的类本质的背离,而是私有财产现实运动的产物和结果,是劳动自身由“特定劳动”转变为“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异化劳动或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而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一条件之中,即思辨的力量和运动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现实的思辨和抽象所决定的。因此,无论是异化的克服,还是形而上学的终结,都不仅仅是思想的任务,而更是实践的任务。

五、价值哲学的困境及出路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它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还促进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大都是依照认识论(知识论)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框架来处理价值问题的。在这种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和问题。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界就开始了主体—客体模式的反思和批判。21世纪以来,为了超出主体—客体模式,摆脱对价值的工具性定义和效用性理解,寻求专属于价值哲学的思路和方法,哲学界更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提出了“人学的路向”、“人类存在论的路向”、“超验的路向”和“生存论的路向”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这四种路向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

尝试。但问题在于,这四种路向虽然在起点上有所区别,但在终点上却殊途同归了。确切地说,它们在说明人的价值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的二重化理论,都赞同“只有人才拥有绝对价值、本体价值和原生价值”的说法,都认为价值的本质就在于人的自我超越。这样一来,它们就仍局限于康德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只有“善良意志”才拥有“绝对价值”的概念。这种局限决定了国内哲学界只能始终在“自我超越”(绝对价值)和“有用性”之间徘徊。在此徘徊之际,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始终未被深思。因此,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对价值哲学的概念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考察,并在此考察的基础上彰显马克思对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的澄明。

六、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性问题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梳理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内涵和实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基本架构中最为重要的塑造力量,决定了当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与当代人的命运走向。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使人类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但与此相伴随,它所蕴含的风险也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危机。基于对这种困境和危机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更遑论对马克思的超越了。在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表现出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独创性。马克思不但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根源,而且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内在机制中对资本的本性进行深入的解剖,从而达到对现代性的辩证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对以资本为核心、以理性主义为形上基础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非具有其所声称的普遍性,工人阶级不公正的生存状态所表明的整个社会的悖论和错乱,充分证明了现代性方案及其解放的虚幻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现代性的价值。“现代性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破灭,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完全失去了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通过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就能在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真正实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这种辩证批判,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仍是我们未完成的事业。一方面,作为现代性核心内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个体主体性虽有所发展,但远未完善。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粗放经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要把“个体主体的培育和形成”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要注意克服现代性的弊端,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作中国现代化的

根本目标。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既是构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所在。

七、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当前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它既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人类社会经验发展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问题、发展理论上的最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重大的理论成果。它既是对西方现代社会中发展理论的借鉴和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总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同时又是“文化的活的灵魂”。^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也必须回应时代之声，回答时代和当代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只有在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成为时代需要的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研究^{*}

罗本琦

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结合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实践对于理论的需要、理论满足需要的程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联结点或纽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得到解释。进而言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展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文化精神上的相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结点或纽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实现的呢？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立足发展着的中国国情，整合民族文化，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着眼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从而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深入。

一、坚持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前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中国人民不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表现为抽象的理论或普遍性真理的具体化。这一过程的出发点是理论本身。相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有着独特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总体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人类总体精神发展的方向。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明确提出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进

^{*} 安庆师范学院罗本琦主持的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研究》（批准号为AHSK03-04D51）的成果摘要，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汪青松、余精华、陶庆、王有炜、蒋淑晴。

而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的基础上把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实践的科学,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不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895年,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与之数十年革命实践经验时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用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展性、开放性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证明,只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民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二、立足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中国”,质而言之,是中国国情。国情有如植物生长的土壤,并不是任何一种植物都可能在特定的土壤条件下生根、开花、结果。国情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着的客观存在,从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时俱进地对发展着的国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说,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国情使然,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则证明:只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着的、具体的国情相结合,走“结合的道路”,在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或国情的质变。鸦片战争使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为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库。相对于鸦片战争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属于“迟到”的真理。然而,正是这“迟到”的真理,“从其一开始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在短短的几年内便蔚为显学,仅用了二十几年的工夫就席卷了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胜利”。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国情需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但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更不可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与中国有着十分不同的背景下

产生的科学理论。到19世纪60年代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规律的考察都是以西欧为蓝本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研究东方社会问题,但由于他们不曾来过中国,对中国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只是对东方(包括中国)社会做出一般性的分析。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质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指导中国救亡图存、富民强国大业的历史使命。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只能是发展着的中国国情。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不同时期、在对我国国情深入调查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的国情基础上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世纪,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世纪中国国情的变化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传统诠释形成挑战。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经典定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诠释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如何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位,如何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诠释中得到其解。因此,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仅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或传统文化范围内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而且有机械论或文化倒退论之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时期都必然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的时代性与具体性。但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涵盖时代性与具体性,又要超越时代性和具体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做如下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过程。进而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的过程;是立足发展着的中国国情,在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解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三、整合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风格

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和融合、实现中国民族文化整合和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价值,这正

是文化交流乃至文化融合的意义所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正是在这种交流之中取长补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但并不是任何两种文化都能够融合。民族文化的排他性决定了文化交流或融合都必须以文化精神的相通为前提。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从社会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都与中国民族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然而,在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的中国,唯独马克思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传播并跃居绝对主导地位。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功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惊人的近似性或者说契合性;更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地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将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民族文化整合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当然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与连续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因此,对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应当从研究方法上找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的比较文化研究。一般的文化比较研究,要求有相近的历史背景、相似的内容、相似的命题或范畴,以及类型相似的人物。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成功的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内容、概念、命题及人物不完全相同的文化事实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孕育了新的文化形式。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虽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概念、命题、内容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文化精神上也不是完全相同,但存在着文化精神相通的可能性,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的可能。对于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联的前提下形成的不同观点,我们也有必要深入思考,力求形成更具合理性的解释。从文化精神层面谋求统一是值得一试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实践理性、社会理想以及价值目标上却有着相通之处,或者说存在着契合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的文化学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思潮或文化运动中不容忽视的两个紧密相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即现代化问题而言,其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立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用现代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来审视、诠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既具有民族特色而又具有普适性的思想成分,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有益内容,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和转型;另一方面,在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批判和扬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升华或现代化。而上述两个方面的内涵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的民族文化形式。它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母